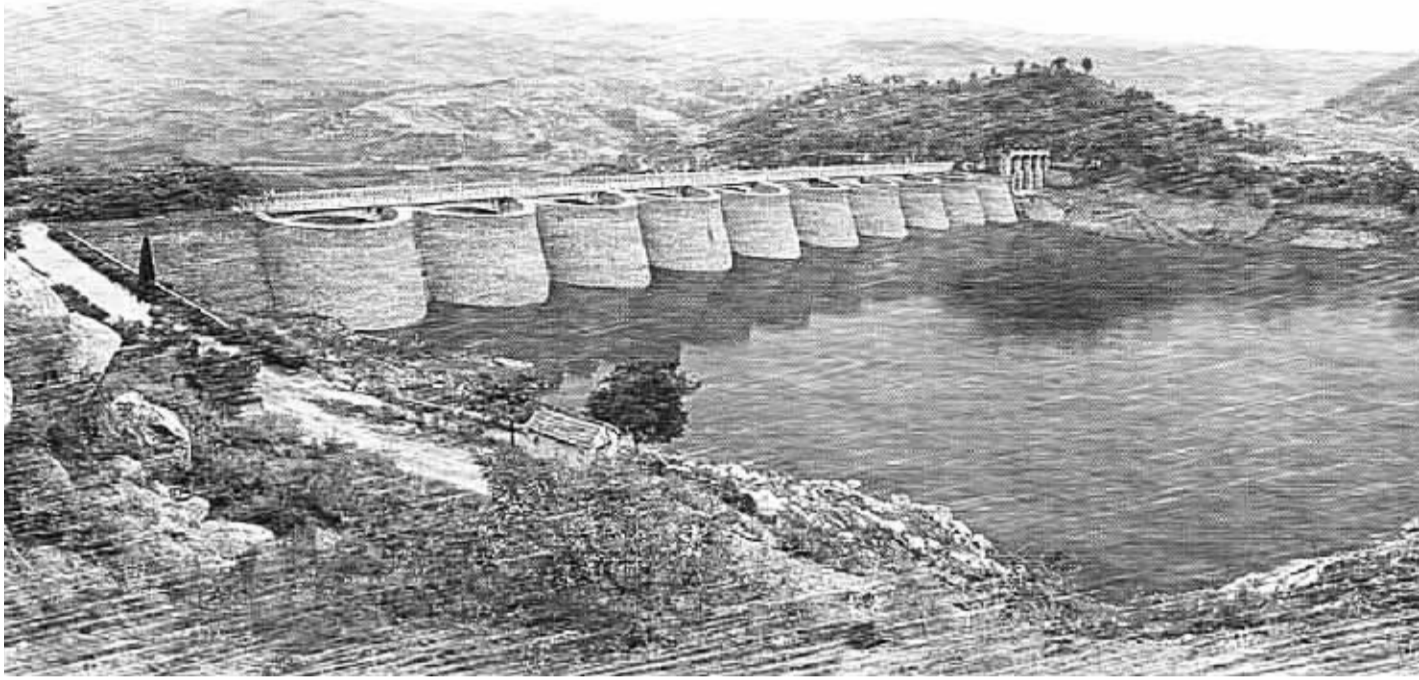


平生志在治山川

□ 本报记者 杜铭



谭靖夷，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专家。主持建成流溪河、柘溪、乌江渡、东江等大中型水电站大坝8座，形成水电站总装机163万千瓦，灌溉农田150万亩。其中，贵州乌江渡水电站为岩溶地区建设高坝开辟了道路。



“平生志在治山川，闽粤湘黔不计年；何惜青春成白发，喜看水电展新篇。惊涛骇浪犹紫梦，高峡平湖别有天；四化征途堪再战，丹心捧向红旗前。”今年92岁高龄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在61岁入党的当夜，曾用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一生的志向和水电情怀。

“我这一生还真和我们党有不解之缘呢！”谭靖夷动情地对记者说，“我一生有几个重要时段，都紧密地联系着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我在衡阳出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正在福建古田水电站工作的我热切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当时未能如愿，但那却是我真正走向党的怀抱的第一步。今年是建党92周年，我今年正好92岁。可以说，我是和我们党一起长大的。”

得知记者前来采访，谭老又作了一首《耄年吟》：“得展平生志，工成利在民。百年争旦夕，万木喜逢春。”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意，以及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拳拳之心。

报效国家 结缘水电

我就是喜欢祖国的山山水水。

谭靖夷，这个名字就烙有深深的时代印记。1921年，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小山村里的谭靖夷，被父亲寄予了殷切期盼，希望他“将来能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效劳”。“靖夷”一词，来自《诗经·大雅》：实靖夷我邦。从此，谭靖夷的一生，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投身水电事业，则是因为1946年谭靖夷大学毕业时，当局曾考虑按照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构想，在长江三峡建一座600万千瓦的水电站。各大报纸都在宣传三峡工程，谭靖夷深受鼓舞。所以，尽管班上大多数同学选择了待遇优厚的铁路工程，他却毅然选择水电作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干就是67年。

从古田溪电站开始，谭靖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施工一线，与水电工程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1952年3月，古田溪水电站主体工程引水隧洞开工。引水隧洞刚开挖就遇到了拦路虎——硬似钢铁的纹纹岩，

工程进展缓慢，而从有关隧洞开挖专著上也难以找到现成答案。年轻的谭靖夷和其他技术人员一道，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寻找解决办法。每次钻孔爆破后，他们都钻进隧洞实测钻孔爆破具体数据，晚饭后又和工人师傅聚在一起研究，不断修改钻孔和爆破方案。仅用了3个月，隧洞单头月开挖进尺就提高到120米。

直到今天，他依然坚持到工地下现场亲自查看施工情况，直接和一线员工交流，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他经常是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地跑，不到一线工地不罢休，再困难再危险也拦不住他。尽管早已退休，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他依然以高龄之身从事水力发电工程技术咨询活动，时间长达3213天，平均每年160.6天，至今也未停止外出活动。

谭靖夷也曾多次有机会调到北京。在农村长大的他，声称自己就是喜欢祖国的山山水水，而不是大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他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裕生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条件艰苦的水电工地，选择了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洒遍祖国大江南北。

追求完美 一丝不苟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工程质量来不得半点马虎。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家华，自称是谭老的“徒孙”辈，他们对谭老是既尊敬又害怕。因为谭老总是一丝不苟，对工作极其认真，每一项数据都问得很细，经常问得他们答不上来。他在工地考察，对于工程关键部位，条件再艰难也要亲自去察看。每次看到施工过程出现不符合要求的地方，他都会提出严肃批评。特别是对三峡、溪洛渡这样的巨型工程建设，他提出了“完美无缺、无疵可求”的质量要求，严把质量关。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

1956年5月，谭靖夷参加广东流溪河水电站建设。当时，未满35岁的谭靖夷被破格提拔为总工程师。在流溪河工程中，谭靖夷十分重视质量，规定拱坝模板安装误差不得超过5毫米。有一次，因模板在浇筑过程中

变形超出要求，混凝土出现了几个平方米的蜂窝麻面，他责令大坝工区主任和主任工程师在工区职工大会上作深刻检查。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谭靖夷却认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工程质量来不得半点马虎。他授权工程质检人员：质量可能出现问题时，可现场下达暂时停工令。严格的制度，强化了大家的质量意识，整个工程建设中暂时停工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

流溪河工程从1956年7月开工到1958年8月正式发电，历时仅两年，建成一座拱坝、一条引水隧洞接地下厂房，工程质量优良，施工期全坝无裂缝，坝基灌浆廊道无渗漏。

有一次，一位日本水电专家到流溪河电站参观，根据以往的经验，估计坝内灌浆廊道会有渗漏积水，进廊道前要求换上高筒雨靴。可到了廊道里，他发现整个廊道都是干的，到处寻找，只找到一个灌浆孔孔口稍有湿印。他惊讶不已，竖起大拇指称赞道：“中国人创造了奇迹”！

1989年和2008年，谭靖夷本人也曾两次重访流溪河工程，穿着布鞋走进坝内灌浆廊道，目睹廊道仍然滴水不漏。2008年，他还要求从坝面取混凝土试件进行试验，结果表明混凝土强度不但没有衰减，反而提高了。谭靖夷说，“看到电站几十年后还焕发着青春的光芒，我甚感欣慰。应该说，流溪河电站拱坝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座坝。”

谭靖夷一生参与修筑过80座各种类型的大坝，亲身打过风钻、放过炮、浇注过混凝土，并在水电施工技术攻关和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业内尊称为“筑坝专家”。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震中，距离他领导水电八局建设的沙牌水库大坝只有30多公里。山都震塌了，大坝却岿然不动，结构和坝体表面完好无损，被誉为汶川特大地震中最“牛”的大坝。

勇于创新 突破禁区

原来不会干的事，现在会干了；原来干不好的事，现在能干好了，同样也是一种创新、一种进步。

对于自主创新，谭靖夷也有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搞土木工程建设也需要有创新精神：原来不会干的事，现在会干了；原来干不好的事，现在能干好了，同样也是一种创新、一种进步。贵州乌江渡水电站的建设，就体现了谭靖夷宝贵的创新精神，为岩溶地区建设高坝开辟了道路。

乌江渡水电站建在一个“V”形峡谷中，坝高165米，是我国在岩溶地区建设的第一座高拱形重力坝，总库容约23亿立方米，装机63万千瓦。坝址区岩溶发育，探明的溶洞总体积超过8万立方米，断层500多条，甚至在河床以下200米深处还有大型溶洞。这类地质条件，当时在国内外都被视为建高坝大库的禁区。特别是工程开工后，又发现大坝上游作为隔水层的页岩被断层错开，使上下层岩体形成岩溶通道，更增大了水库防渗工程的难度。水库能否蓄住水？大坝是否稳定？洪水能否安全下泄？成了水电总局和水电部最为担心的三大问题。水电部曾专题报告国务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批示：工程继续兴建，但要下决心查明地质情况，补做必要的地质勘探工作。为此，可适当放慢工程进度，确保工程安全。

通过勘测、设计、施工各方面专业人员的长期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在探明岩溶分布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挖填、全面灌浆的岩溶综合处理方案。为攻克岩溶夹泥地高压灌浆的技术难关，谭靖夷与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分两个时段，进行了长达40个月的试验和严格检测，终于首创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压灌浆工艺。

现场检测与室内试验证实，这种工艺使岩溶夹泥在高压水泥浆体多次反复作用下被挤压密实，并被水泥浆体分割包围，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性状，成为能承受高水头的可靠防渗体。而且便于施工，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乌江渡大坝防渗帷幕线总长1175米，防渗面积18.9万平方米，采用上述高压灌浆工艺取得的防渗效果十分显著。

谈到这里，谭靖夷用一组数据印证这一效果：“水库自1980年开始蓄水，至今已超过30年，两岸及河床坝基每昼夜总渗水量仍长期保持在40立方米以内，幕后扬压力系数仅为0.1，为国内外所罕见。”

1985年，谭靖夷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大坝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乌江渡工程防渗帷幕情况。当他谈到乌江渡工程一昼夜仅渗漏30至40立方米水时，几位外国专家表示怀疑，问他是不是把小数点标错了，他们认为这么小的渗水量是不可能的。谭靖夷给予了“数据准确无误”的明确回答。

在乌江渡工程建设中，谭靖夷和他的同事们取得了600多项大小科技成果，其中重大成果20多项。1984年，乌江渡工程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1985年，谭靖夷作为《在岩溶峡谷地区建设乌江渡水电站》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97年岁末，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祖国对他江河生涯不断攀登科技高峰的最高奖赏。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水电部总工程师李鹏鼎在当年的院士评选会上是这样评价谭靖夷的：水电施工方面的技术问题，没有谭靖夷解决不了的！

2013年，谭靖夷即将跨入93岁。他依然天天坚持锻炼身体，他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以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继续为国家作贡献，继续用劳动和汗水为祖国添砖加瓦”。



采访感言

从江河走来的院士

□ 杜铭

连续多日39摄氏度的高温闷热天气，炙烤得8月的长沙像着了火。采访地点在水电八局办公大楼7层的会议室，大楼没有电梯。记者见到水电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双目炯炯有神的谭老，腰杆挺得笔直，说话中气十足，谈笑间站直了身体、再弯下腰，双手竟可触地，为记者示范他每天一个半小时早锻炼的“自编动作”。他还笑言自己以为是在8楼采访，刚刚一口气爬了8层楼梯。

水电八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谭老视察工地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很多四五十岁的人都跟不上他的步伐；平时搬着厚厚的一摞资料上下楼更是不在话下，从来不用别人帮忙，也没有秘书。一年中有半年时间跑在水电工程建设工地上的谭老，面对记者惊讶的目光，习惯地挥挥手，干脆利落地说：“要是不能跑，就不要搞水电。”

谭老的这副好身板，可真是跑出来的。在近70年的水电生涯中，谭靖夷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江河湖川。福建古田溪、广东流溪河、湖南柘溪、贵州乌江渡、湖南东江等大中型水电站的建设，以及湖南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桃江水库等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名字。一生中，他亲自参与建设和技术咨询的水电大坝有80余座，被誉为“从江河里走来的院士”。

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再高些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党支部书记 胡建党讲述 本报记者 谭辛整理

我叫胡建党，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一家加拿大保镖公司开出每月8000美元的工资让我去，但我的理想和兴趣不在那，拒绝了。此时，北京市开展大学生村官选聘，学校推荐我报名参加。起初我有些犹豫，父亲却对我说“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农村，而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当时我就想，父亲的话对啊，我应该用自己的青春和知识，把自己的发展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农村的发展之中。

真正当上“村官”后，我经历了3个月的郁闷期。第一次从镇上到王场村，我憧憬无限。但一进村，我傻眼了：村里的房屋低矮、破旧，全村上下没一条像样的路，各家的垃圾散乱扔在路边，成群的苍蝇在上面嗡嗡乱

叫。这里怎么比老家农村还要差呢？在我的想象中，首都的农村应该富庶繁华才对。这种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在不少大学生村官身上可能都曾发生。

该如何改变现状？我开始琢磨。王场村地处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东南角，位于三镇交界处，是有60户200口人的小村庄，村中经济主导产品为西瓜、蔬菜。自然季节种植西瓜、蔬菜，销售价格都平于或略低于市场价格，村里没有特色产业，也没有产业附加值。怎样才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呢？我开始寻找出路：从河北遵化、正定等地的印字西瓜，到山西的紫枣种植，我自费跑了不少地方，但这些都不适合王场村实际情况。2008年，我与另一名大学生“村官”陈墨开始探索

种植食用菌致富的路子。

食用菌种植技术要求不高，适于村民学习掌握，而且原料广泛，生产周期短、投资少。但要想在农村推广，如果看不到“甜头”，是没人会真的干起来的。为此，我们制订了带领村民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做给村民看、带着村民干、帮着村民富。

我们准备成立食用菌合作社，先干给村民看。但现实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开办农业合作社的资金从哪儿来，土地从哪儿来，技术从哪儿来，销路又从哪儿来。在这关键时刻，镇党委书记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你们放手干，剩下的我来想办法”。镇党委书记亲自与村里协调，挤出10亩土地作为蘑菇生产用地，又专程交代镇农技推广部

门，技术上给予最大支持。大兴区村官办也对我们的想法全力支持，并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邮储银行从资金上想办法。在各方的鼓励支持下，我和陈墨拿着多方筹集的15万元，成立了北京爱农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以爱农、兴农、富农作为我们一切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上了创业之路。

目前，我们的爱农星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投资达到300万元，已经拥有16个崭新的蘑菇大棚，建起了保鲜库、采菇房、发菌室、接菌室和拌料场，还有一个蔬菜育苗和新品种试验推广基地，年生产瓜果菜60多万斤。先后有100多户村民加入合作社的种植，直接和间接促进80余名村民就业，在合作社帮工的村民，月工资收入超过2000元。

几年下来，王场村发生了很大变化。村庄实现了绿化美化，家用上了太阳能。王场村的点滴变化，激发了年轻人创业的热情。王场村的人均年收入从2007年的7800元提高到2012年的15656元，强村富民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王场村与多所高等院校进行了红色“1+1”结对活动。我们请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同学来为村民讲解生活卫生常识；请传媒大学的同学带村里的孩子到大学体验生活；请北京农学院的老师来讲课，把王场村作为农学院学生的实践基地；请北京体育大学的同学来村里教村民练习太极拳和养生功。我们还多方面加强王场村与外界的联系，促进村民的思想观念更新。

现在，我们村庄以蘑菇种植品牌和黑紫色农产品为切入点，逐步形成蔬菜、西瓜甜瓜种植和以蔬菜新品种示范、推广、配送为主的产业链条。下一步，我们准备发展旅游和餐饮，继续带动村民致富。

今年6月1日，我被选为村主任，感觉担子更重了。我现在的梦就是，在3年之内，让我们村民的收入再翻一番，不但让老百姓口袋再鼓一些，而且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再高一些。